



中国 社会主义 的再认识

蔡仲德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D6V
27

71907

DI 13/20

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蔡仲德

同济大学出版社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5页）

责任编辑 马文瑜

封面设计 徐 繁

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蔡 仲 德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123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125 字数：104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0.90元

ISBN 7-5608-0113-7/c·2

写 在 前 面

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再认识方面，党的十三大为我们奠定了新基石，开辟了新里程。本书定稿，适逢其时。我也就借此表明自己要努力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态度。

这里的七篇文章，实际上是习作，构不成“一家之言”。它们引出的问题将比试图弄清的问题要多，这是我已经有的经验。我之所以敢于将它们发表，正是为了求得探讨，真正弄清问题。

见过这些文章的同志，有的嫌之引文太多。我要说明的只是：这是因为我想努力从马列的原著中学得一些什么。同时，也为借此看看，现今那些宣扬什么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到底有什么根据，到底是什么“科学”。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列宁1919年7月的演讲《论国家》。他当时希望在座的大学生在听讲后，“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他特别强调：“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谈话和讲演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你们只有学会独立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我的经验十分有限，但我确实体会到，这是至理。一个人，如果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没有根底，又不独立思考，那就只会受人愚弄，或者自我愚弄，在某种条件下，又会去愚弄别人，误人子弟。我上大学读书四年，在大学工作二十七年，在这方面的教训

何其痛切。

去年十月间，回答我校一位大学生所问时，我请他看了我的两篇旧作：《剥削阶级消灭以后的阶级斗争》和《值得好好研究的一门科学》。看后，他说：“它们澄清了或者十分有助于澄清我思想中的许多疑惑”，并且认为文章中论述的问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十分需要了解的。他建议我争取发表之。我当然为获得一个知音而高兴；也不免惶惑：事情正如他说的那样吗？但是，他确实促使我下了决心，将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这里了。它们有过耐人寻味的经历，现在一如原样，只是为了避免与本书其他文章重复，删去了一些引文（但仍难免有所重复，请读者鉴谅）。

鉴于上述这些，我愿把这本习作献给培养了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年适逢它建校五十周年），献给扶植了我的同济大学的师生员工（今年正逢它八十大庆）。就以这本习作来说，如果不是同济大学出版社同志们的鼓励、督促和帮助，又何能见世？毋庸赘言，我也衷心感谢本书的编审者。

作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目 录

第一篇	社会主义再认识问题.....	(1)
第二篇	农民——中国特色.....	(31)
第三篇	试析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45)
第四篇	剥削阶级消灭以后的阶级斗争.....	(62)
第五篇	值得好好研究的一门科学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6周年.....	(82)
第六篇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溯源.....	(102)
第七篇	要讲辩证法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点思考.....	(114)

第一篇

社会主义再认识问题

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一)

再认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那末，对社会主义来说，这一点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里涉及的正是人类社会实践和思想认识的亘古未有的开拓性领域，正是创造人类新纪元的问题，正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问题。“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已经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73页）。同时，人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即便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于人世，也才七十年。对于已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文明史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的新的一页。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

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英国费边社一个领导人爱·皮斯曾请恩格斯为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撰文，简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1886年1月27日恩格斯回复说：“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1891年7月1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又特别强调：“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变化，每隔十年，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

总之，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的一贯到底，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之关键所在，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区别所在，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

万古长青之生命力所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僵化自己的头脑，更是从来没有束缚后人的手脚，而只是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社会主义客观真理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一切还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二)

领导创立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是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典范。

1915年，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列宁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将近八年之后，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难创业阶段，列宁在1923年1月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中，驳斥了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责难。列宁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而根本不懂历史辩证法。列宁特别批评了他们“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的，”用以为评价俄国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即“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问得好：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现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

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692页）

这些论断的伟大革命创造意义，是早已为历史所证实了。

列宁的革命胆略，来源于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他始终是异常清醒、十分严谨的。从上述论断，人们就可以琢磨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列宁还曾直截了当地、反复地强调过这样一点：

“我们之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不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别国的工人阶级高明，而仅仅是因为我国过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列宁全集》第27卷第213页）

他具体分析说：“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列宁选集》第3卷第550页）

可以说，列宁伟大一生的最后岁月，就是献给解决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前所未遇的巨大历史矛盾的。

实际上，这也正是列宁1919年11月向东方共产党人提出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

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在苏维埃俄国的初期，1918年7月，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的确，我们丝毫不害怕向你们承认，而且看了我们的法令也会知道，我们是经常修改法令的，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什么完备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分条列款的定型的社会主义。……

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还刚刚在建设，新的纪律应该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要在改造和重建中取得经验。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67页）

经过几年，1921年10月，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总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年头的实践经验后，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进行这样一个在全世界是新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石头’和‘坚定不屈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另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

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显得不适当或行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六十六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温这些论断，不是益见其清新夺目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前进路程吗？列宁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的伟大革命胆略、非凡理论勇气和他的宽阔无私的胸怀、深邃透彻的目光，在社会主义再认识方面，给了我们多少珍贵的、温故而知新的启示！特别是，从上面挂一漏万的引述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列宁始终着力于解决一个史无前例的根本性课题：怎样不怕打破历史常规，学会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这，不正是当代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再认识方面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课题吗？

(三)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未竟的事业。

尽管斯大林后期犯过严重的错误，至今还引起不绝的议论，既有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非议和责难，也有来自同路人的嘲笑和攻击，更有来自敌人的毁谤和辱骂。但是，即使根本谈不上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国学者伯恩斯，在其所著《当代世界政治理论》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虽然斯大林由于其继承者的谴责而名誉被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能还要继续占一个重要位置。他的确残忍，但他通过那些有名的五年计划为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歪曲。

1956年，在非难斯大林成了世界性时髦的岁月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其名著《斯大林时代》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清流。这位曾经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对待的著名美国记者，公正地指出：

“斯大林时代不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足以制止希特勒的力量，它还建设了今天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各国家的经济基地；创造了富余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有自由在公开市场上选择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说，它建设了许多国家能够赖以获得多样发展、取得自由以及在持久和平中建立团结的基地。这一时代发生的一些坏事有许多原因——由于俄国过去的习惯，由于敌对势力包围的压力，由于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以及部分地由于那个领导人的性格。它们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工人阶级把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让给了一个文盲的、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农民去做，而这些农民虽然自知对于这样一个任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却仍然进行了这一建设。”

斯特朗的这个论断，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因为，她在这里讲到的问题的症结，恰正是我前面引用的列宁的论述中提出的问题的实质。相距近四十年，一个美国女记者和一个俄国无产阶级领袖的所见如此吻合，又正是说明了“现实生活”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所提出的问题，是无所不在的，是不可避免的，是终究必须解决的。

(四)

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之后，社会主义成了世界性潮流。欧洲、亚洲乃至拉丁美洲，相继涌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南斯拉夫首先印证了列宁的上述论断。它的独立自主的自治社会主义，成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序曲”。它的改革，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河。

几乎与之同时，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带偏见的人们有目共睹：这部著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与夺的地位。它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回答了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商品生产问题、价值规律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都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

好的问题。尽管斯大林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好这些问题，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睿智，为后来者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开拓了一条正确的思路。人们不难发现，当代社会主义再认识中的核心问题，正是斯大林重新提出的这些问题。

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再认识，真正发端于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以其“秘密报告”使全世界大吃一惊。他以颇不严肃的态度和手段批判斯大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尽管如此，他对个人崇拜现象的尖锐揭露，他对由此造成的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和阴暗面的猛烈抨击，却不能不引起一切有头脑的人的严肃思考：**为什么在素称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竟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消极现象？为什么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或者说，**为什么斯大林那样严重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苏共二十大之后，一系列的事件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都存在个人崇拜和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大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出现了僵化、停滞的状态？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有那么多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乃至穷兵黩武的现象？

为什么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那么多的“事件”、“暴乱”……？

为什么……？

总之，问题无穷，思考未断，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空前的思想活跃，惊人的认识混乱。五光十色的“观念变

革”，层出不穷的改革方案。风起云涌的改革家，标新立异的理论家。一切似乎都得重新探索，重新估价。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被卷入了改革潮流。在不少国家，改革几起几伏，步履艰难，欲罢不能，欲进又难。“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空前未有的挑战，史无前例的机会。至今还在过程之中。“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

（五）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块界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开始，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开始。

这一讲话发表的**时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毛泽东一开头就将它点明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十个问题中，很突出的一个，就是“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依然是农民问题，同农民的关系问题！

翌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和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为我们对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在众多重大问题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第一次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而且特别强调这“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

如果说，上面这两个讲话，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这样一个时刻发表的，更多高昂的乐观主义的话；那末，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在随后多年曲折、失误之后发表的，更多了清醒、冷静的色彩。正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异常突出地提出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由于国内外和党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而后中国社会